



植棉组受奖

□ 耿仁国 张明立

右边两张图片,大图是1979年阳谷县安镇(今安乐镇)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与第七生产队委员会成员合影。小图是第七生产队植棉组成员及其帮忙拾棉花的亲属合影。

1979年秋后,南街大队第七生产队18名妇女平均每人分得现金73元,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街大队农民的第一笔收入。

1979年春,“五定一奖”(“五定一奖”责任制,即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到作业组,超产奖励)作业组散了后,原来的超产奖励政策取消了,严重打击了群众干活的积极性。这18名妇女情绪低落下来,干活也不再使劲,因为按过去的记工方法,妇女劳力再强,也是一天记八分半,有的家里事多,体弱的只能记六分。看着她们干活磨洋工,队长说:“还是按照先前的政策进行超产奖励。”这些妇女又加劲干了起来。棉花坐桃时,棉铃虫见桃就钻,把花蕊吃了,需要打药。她们天不亮就下地打药,干到天亮时已打了三桶药,喝一碗稀饭又接着打,中午也不休息,甚至有的倒在地里吐白沫,被人救过来休息一会儿继续打。

棉花长势越来越好,就要摘花了。估摸着这些妇女要拿钱了,队里的人不

愿意了,说这十几名妇女能分百十块钱,那不反了,给她们每人扯件的确良小褂哄哄就行了,哪能当真?这时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玉亭还为第二天的植棉任务落实不下去而发愁,听说七队的棉花种得好,像遇到救兵似的,马上跑到地里查看,并要求会计算出账来,第二天把十个生产队的队长召集起来开现场会。

这18名妇女要求按合同先算账,把所得奖金按一半先发下去,生产队贫农组长与保管员死命顶着,不肯兑现。

晚上账算不出来,第二天便没法开现场会,刘玉亭急了,深夜11点赶到队里,让会计算账。贫农组长与保管员尽打岔,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刘玉亭看出他们是不想兑现,气得一拍桌子,火冒三丈:“你们糊弄群众还想糊弄我,今天算不出来,明天撤你们的职。不换思想就换人,能当干部的不止你们几个。”队长出来打圆场说:“你们不要绕弯子了,算吧。”不到一袋烟工夫,数字就蹦了出来,平均每人奖励现金73元。

第二天上午,南街大队十个生产队队长都来了,刘玉亭大嗓门喊开了,不是我抬举这18名妇女同志,是国家需要棉花,都干活不下力气,磨洋工不出产量,城里人吃啥、穿啥,你们用什么养活一家老小?经过了春,经过了夏,大家看清了吧,还是靠责任制,要包产到户,



▲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玉亭(左三)与第七生产队委员会成员合影。

张丕成 摄

▶南街大队第七生产队植棉组成员及其亲属合影。

张丕成 摄



联产计酬,不用这办法不行。

这18名妇女当场领到现金,多的90元,最少的也有67元,并要求队长照张

合影留作纪念。等其他队的队长走了,队长叫来南街大队摄影师张丕成,拍下了这两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口述 我的古城记忆

□ 李晶

1979年初秋,我转学到古城内的聊城实验小学读二年级,父亲把我交给住在学校对面郁光街的大舅奶奶——这条小巷因为张郁光抗击日寇在此牺牲而得名。父亲说,以后你就住在大舅奶奶这里,要听话。然后他对大舅奶奶说,大丫头,孩子就交给你了,不听话,该打打,该骂骂。大舅奶奶说,行了,你快走,不过是添双筷子的事儿。

当时,大舅爷爷已经去世好几年,大舅奶奶也不过五十多岁,有一儿四女,其中两个女儿已经结婚,家里还有刚刚参加工作的三女儿和上高中的儿子,读初中的小女儿。跟在她身边的,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外孙女,叫燕子,是她大女儿的孩子。这样,再加上我,就有六口人了。

大舅爷爷在世时,他们就以做鞋为生,并以此养活了五个子女。

大舅奶奶的鞋店

古楼东大街路南,距离古楼100多米的,有一间狭窄的临街房,是大舅奶奶的鞋店。房子没有窗户,即便是白天,屋内也是昏暗的,大大小小的楦头和鞋帮鞋底就堆放在屋内的小木桌上、架子上。做好的鞋子,实木的楦头还在里面支撑着,等订做人来取鞋子时,大舅奶奶才把楦头取出,把模样饱满周正的鞋捧到客户面前,让人家坐在小马扎上试穿。试穿时,地上铺块破布。客户穿好鞋,站在破布上跺跺脚,原地走两步,然后爽快地付钱。等客户心满意足地走了,大舅奶奶才收起破布,蘸着唾沫数一数那两张毛票,数好

了,小心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春夏秋季下午放学时,太阳往往还挺高,大舅奶奶肯定还在鞋店忙碌着,我就牵着刚从幼儿园放学的燕子,出来校门向东走,然后折向北到了东口,再向西走一段路,就能看到她坐在鞋店门口,一边和左邻右舍热热闹闹说着话,一边咿咿呀呀地上鞋。大舅奶奶做的鞋,不是千层底,而是赭褐色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压制成的——这样的鞋底应该是能防水的吧。

大舅奶奶一般面朝东北斜坐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光从她有些佝偻的背上、花白的头发上倾泻下来。她腿上铺着一块深颜色的布,上面放着一只里面撑着楦头的鞋。沿鞋底边缘用锥子钻透,左右同时插入穿上粗线绳的大针,然后同时拽出针,双手用力将线拽紧,再开始用锥子扎下一个孔。扎孔,穿针,引线,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循环往复,很快,一只鞋就上好了。大舅奶奶眯着眼,前后左右仔细打量一下这只新鞋,若是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拿出楦头,把鞋套在放在两腿之间倒立的铁制脚丫上,用小锤子敲敲打打进行整形,整好了,拿起来举到与眼睛齐平照量照量,再放在齐胸的地方俯视俯视,确认没有问题了,才满意地叹口气,开始上另一只。

这种做鞋的方式和我以前所见的完全不同。奶奶和母亲做鞋,都是先纳鞋底,做鞋帮,最后上鞋时,也只是用一根针把鞋底鞋帮牢牢缝在一起,根本就没有铁脚丫,更没有那些大大小小的木楦头,所以,她们做出来的鞋,是干瘪的,需要用肉肉的脚把它撑起来。

路灯亮了,收完摊,大舅奶奶锁上

门,一手抱着一个包袱,里面是没上完的鞋,一手牵着燕子。我跟在后面,默默把她的包袱拿过来,在怀里抱好。一路走,一路和街坊们大声打着招呼。正是做饭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小煤炉子在风箱的鼓荡下,正伸出耀眼的火舌,舔舐着乌黑的锅底,饭香随着热气飘散出来。从门口直接往马路上泼泔水的主妇大声对大舅奶奶说,下班了?饭做好了,吃了再回家吧!

不了,回家也是现成的!

路面坑洼,我们选平整的地方走。偶尔有汽车经过,扬起一阵尘土,行人或扭头,或掩鼻。下雨天路面污水横流,最怕踩在水洼里,或者被溅一身泥水。

晚饭过后,大舅奶奶就走到她堆了很多楦头的卧室里,腿上搭上布,把楦头撑在鞋里,开始赶包袱里带回来的活儿。昏黄的灯光打在她的头顶,她头上就晕起一圈圈暖暖的光。

拣炭核

大舅奶奶家做饭,和我家不同。我家烧柴禾,她家是城里的,城里人都烧炭。

一个开放式的小炭炉,有个风道和风箱相连。炭是用大煤块砸碎,一小块一小块的。做饭的时候,用簸箕盛一些端到炉子前,引燃之后铲一些小煤块放进去,赶紧拉风箱。一阵黑烟冒出,烧火的人一边咳嗽着,一边尽力往后仰着身子,一边加快速度拉风箱。黑烟过后,小煤块变红了,有火苗冒出来了,可以把锅坐上去,该煮饭煮饭,该炒菜炒菜。

西屋的大舅奶奶在门外的院子里做饭,东屋的二舅奶奶在门外的院子里做饭,南屋的老姥爷和老姥姥也分别在

门外的左右两侧做饭(不知道什么原因,老姥爷和老姥姥分开单过,三间房子一分为二,各吃各的饭,各睡各的床,吃饱睡足在堂屋里各坐各的椅子,想说话了就一起聊几句天),一时间,院子里升起一阵黑烟,又升起一阵黑烟,整个院子里到处弥漫着煤烟味儿。我和燕子,还有不久后来的小姨奶奶3岁的儿子小煜,就在这烟雾里追逐游戏。安静的时候,肯定是我带着小煜在开着红色花朵的夹竹桃下数蚂蚁。这个3岁的小表叔,坚持叫我姐姐,若抓到一只蝴蝶,就会叫我好姐姐。他也坚持叫我母亲为“娘”。

吃完饭,炉子里的火早就完全熄了。大舅奶奶用火钳子扒拉扒拉炉子里烧过的煤,将煤渣倒在铁簸箕里,然后喊我和燕子,你俩,去拣炭核(音hu)。

所谓的炭核,就是没有烧透的煤。烧透的煤变成的渣,颜色有些发土红色,而那些看起来还有些发黑的渣,就是炭核了。

我们俩用小手扒拉着煤渣,认真地将炭核拣出来。其实,这些煤渣里,除了有炭核,还有几乎没怎么烧过的蒙了一层灰的炭。遇到这种炭,更是要一个不落地拣出来。拣出的炭核,留到下次做饭时再和好煤掺在一起继续烧。

在家里拣完还不算,大舅奶奶还让我们去垃圾堆那里拣。各家都会把拣过炭核的煤渣倒出去,但不是每家都拣得仔细,总有炭核成为漏网之鱼,而我们,就是去拣漏网之鱼的。若是一次能拣回来两把,大舅奶奶脸上的笑容就多一些。

每次到垃圾堆上去拣炭核,都让我有麦收之后,到空旷的麦地里去拾麦穗的错觉。